



## 岭南文脉

新闻为眼

文脉现状

红色主题出版成规模

编委会主任 曾颖如 孙爱群 孙璇 胡泉

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 
本期统筹 陈桥生 邓琼

主办单位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羊城晚报社

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，南粤大地是一座蕴藏着丰厚红色资源的“富矿”。近日，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持编纂的《红色广东丛书》出版，该丛书全面、系统地梳理了广东红色资源，并深入挖掘其内涵，为党史学习教育与红色血脉赓续提供了一套权威而通俗的读本。

红色资源需要梳理，更需要利用、转化。一代代南粤儿女投身革命洪流，创作出一部又一部经典红色文艺作品。不久前，广东出版各类红色文学作品155部，省作协发布10部红色题材重点作品，广东红色题材主题创作成规模。

回顾百年来的广东红色文化遗产，群星闪耀、硕果累累。近年来，广东大力打造红色历史文化旅游，针对“红色文化+旅游”进行跨界融合，不仅让红色文化遗产“活起来”，也给广东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机遇。



红色岭南吸引了大量游客

近期省内出版红色文学作品155部，文旅融合让文化遗产“活起来”

## 大批文艺创作再现红色岭南

## 擦亮红色文化是当代责任

革命烽火路，红星照南粤。广东是一片红色热土，是国内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、最早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省份之一。

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长历程中，广东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，发动、组织和领导广东人民开展了一系列广泛而深远的革命斗争，大大小小的革命遗址分布各地，留下了宝贵而丰厚的红色文化历史遗产。

2021年6月，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持编纂的《红色广东丛书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该套丛书由广东各级党史研究室、党校和高校党史与历史学者以及知名作家联合打造，以相关的文物、文

胡国胜告诉记者，发生在广东

大埔县的三河坝战役在我党历史上非常重要，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：“朱德在三河坝战役中说了一句很知名的话：愿意革命的跟我走，不愿意革命可以回家，最后留下了800人。后来，朱德就带着这800人上了井冈山，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火种。”

众多故事深埋历史长河中，究竟红色题材该如何书写，红色基因又该如何传承？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、专职副主席张培忠介绍，省作协早在2019年就围绕红色文学创作谋篇布局。创作计划中的54个重点选题里，涉及党史题材，红色文学的创作项目达20多个。此外，各地级以上市作协和

省各行业分会出版各类红色文学作品155部，省网络作协组织网络作家创作红色文学作品30部，红色题材主题创作渐成规模。

6月30日，广东省作家协会发布十部红色题材重点作品，包括杨黎光长篇报告文学《脚印——人民英雄麦贤得》，周晓瑾长篇纪实文学《信仰——周恩来岭南纪事》，张新科长篇小说《惊潮》，陈华清长篇小说《竹魂》等。澳门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朱寿桐表示，广东红色资源非常丰富：“为了不让优秀的红色文化蒙尘，文化人需要时时擦拭。用文学想象再造红色资源、让它们焕发出时代的光彩，这是我们当代文化人的责任。”

## 百年来文艺经典再登舞台

命思想与文学实践带领着欧阳山等一批青年作家走上了为人生、为普罗大众写作的宽广道路。

新文化革命和左翼文艺汇成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广州新文艺的主流。1930年，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（简称“左联”）在上海成立，广东作家是“左联”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支力量。据姚辛的《“左联”史》统计，全国“左联”成员约440人，其中广东籍的“左联”作家有60人左右。

代表性人物如洪灵菲、戴平万、冯铿、冯乃超、欧阳山等，在20世纪30年代都曾深入参与“左联”的创办和发展，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不可忽视的血脉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一大批广东

文艺工作者先后奔赴延安，或以笔作战，或投身革命实践、接受革命的洗礼，其中代表性作家有欧阳山、草明。延安时期的欧阳山深入生活一线，先后创作了《战果》《高干大》，创作风格从欧化转向“本土化”；草明于1947年来到东北解放区的牡丹江市镜泊湖水力发电厂，一年后，发表新中国工业文学史的奠基之作《原动力》。

从延安归来后，欧阳山创作的《三家巷》与黄谷柳的《虾球传》、陈残云的《香飘四季》，共同构成岭南红色经典文本。《三家巷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全国，曾多次被搬上荧幕，作品中的周炳、陈文婷、区桃等青年形象深

入人心，甚至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。当代作家莫言说，他在孩提时代对“广州”的概念都来自《三家巷》。儿时的他读到区桃在沙面游行被流弹打死时，趴在麦秸草上，低声抽泣起来。

羊城晚报记者从广州粤剧院获悉，青春版粤剧《三家巷》将于7月28日开演，该剧以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的广州为背景，通过刻画三家巷中周、陈、何三个家庭复杂的矛盾斗争、命运变换，真实反映了省港大罢工、沙基惨案、国民革命军北伐、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和广州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，再现了大革命时期广州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。

## 从细微角度理解红色人物

“我去过彭湃的家，那是一个四层的白色别墅，直到现在也算得上是海丰县城最好的房子。我也看了彭湃的书法，字写得非常好，可以说是一个书法家。”在陈希看来，革命运动只是背景或题材，要把彭湃当作这个背景中的一个人、一个革命家去写，要突出人的问题，包括他的心灵、情怀。“此外，红色题材的创作还应该贯穿当代人的意识、现代的观念。比如，彭湃明明很富有，为什么会走上农民运动的道路？要用现代的意识去审视他。”

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贺仲明发现了一个变化：以前的红色题材强调写实，关注点放在重大事件重大人物本身；现在大家会侧重选择小的角度，把个人的情感及命运跟重大历史事件结合起来写。“像《惊潮》就把个人的历史跟宏大的革命精神融合得比较好，具有较强的可



读性和文学性。”

当下，广东文学应如何继承百年进步传统，在新时代再放异彩？广东省文联原主席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斯奋表示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，广东文学界一直跟随着时代

的步伐前进，当下，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，广东作家更应投身历史浪潮：“只要我们的作家真正愿意投身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去感受、体验、思考、创作，广东文学的爆发期应该是指日可待。”

## 外地作家扎根广东 写就地道革命故事

“从2016年到2020年，我多次来到潮州、汕头，穿梭在大街小巷里，一边走一边想象曾经发生在这里的红色故事。”《惊潮》作者张新科，用了两年多的时间采访调研，最后写出了这部献给广东潮汕地区厚重文化和壮烈革命的深情大作。他的夫人在汕头澄海等了他53年，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早已被国民党杀害。这个故事太感人了！”

在张新科看来，就红色资源来说，整个潮州都是红色文学创作的富矿。就潮州而言，有姓名可查的潮州籍烈士就多达1319人，登

记在册的红色文化遗址多达430处，还有“潮州七日红”、茂芝军事决策会议、左翼文化运动潮州六杰、中央秘密交通线等十四张红色名片。“然而，从整体上说，这些事件与人物仍然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，缺少一部有历史厚重感、与丰富红色资源相匹配的大作品。”

读理科出身的张新科，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红色题材创作经验，先后推出作品《远东来信》《苍茫大地》《鏖战》《蝶鱼计划》等，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。在创作手法上，张新科遵循文学创作“大

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的原则，每次写作前都搜集大量的历史资料、实地走访采风：“只要采访到位，生活和历史比文学丰富一百倍。”

有了大量的资料后，张新科会选择一个小切口，用文学的思维把历史档案打碎重组。在他看来，创作最重要的就是塑造小人物，通过小人物侧面呈现宏大的革命历史，既不生硬也不枯燥。“人物要符合职业特征，我会观察打铁的、磨豆腐的，尊重每一个细节；同时还要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，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有味道。”

红色旅游  
跳出固有模式  
拒绝“程式化”

今年正值建党一百周年，红色主题游备受欢迎。据《2021“五一”旅行大数据报告》显示，“红色旅游”关键词在“五一”期间环比提升约7倍，与2019年同期数据相比，红色旅游景区订单量实现约375%的增长。

2021年，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1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，包括广州红色羊城主题历史文化游径、孙中山故里历史文化游径、东征革命历史文化游径、南粤星火路红色主题游径、叶帅故里红色游径等，重点展示广东的革命历史与红色精神。

打造红色历史文化游径，一方面，能够有效串联一定区域内价值突出、保存较好的历史文化遗产，沿袭历史线路的陆路、水路及沿线重要的文物遗产和自然资源景观；另一方面，能够挖掘广东丰富而独特的红色文化内涵，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。

此外，近期广东各地文旅场馆、旅行社等以互动打卡、沉浸式舞台剧、体验式研学等创新形式突出沉浸式体验，吸引游客更好地参与红色旅游、感悟红色文化、厚植爱国主义情怀。

以文塑旅，以旅彰文。游客既可以从中感受红色历史，也可以在场景里重温峥嵘岁月。跳出固有模式的红色旅游不再“程式化”，真正走入每一个游客的生活中。

“红色文化传承不能停留在书本里，应该把书里的内容转化为红色地图，重新激活、擦亮这些红色资源。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钟晓毅表示，广东可以打造更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：“以往一提到爱国主义教育，大家就去井冈山，其实也可以来广州，参观革命史迹、感受红色文化。”



张均（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：

## 与新中国同行

——广东红色文艺70年

国共两党在此联手北伐，中国共产党也曾在此发动广州起义。广东，注定是红色文艺的沃土。

由北京、上海远道而来的鲁迅、郭沫若等前辈文人，与广东本地成长起来的丘东平、戴平万、冯铿、欧阳山、草明、冯乃超等青年作者，都留下了呐喊者的文字。不过，广东红色文艺最为繁盛的时期，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十年，尤其是其中“前三十年”。

在新中国成立后的“前三十年”，广东红色文艺产生了经典之作《红色娘子军》。无论是1960年梁信、谢晋共同完成的电影，还是后来中央芭蕾舞团据此改编的芭蕾舞剧，《红色娘子军》都以细节的准确、情感的饱满以及与家国命运的深切共情，成为20世纪中国文艺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
这部电影是出身第四野战军的作家梁信到海南采访偶然所得，但偶然中也包含着必然。它既是一代人关于“血和铁，火焰和毒，恢复和报仇”的青春记忆，更是一个民族从地底深处迸发出来的、刺破漫长黑暗的呐喊之声。用米歇尔·福柯的话说，这种文艺从历史的阴影出发，注定“要成为那些没有光荣、失去光荣以及现在暂时或者长久处于黑暗和沉默的人们的话语”。

与此类似的、出自广东作家之手的作品，还有《三家巷》《虾球传》《高粱红了》《董存瑞》《欧阳海之歌》。甚至，作为这个时代的回响，以周文雍、陈铁军（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）之悲壮事迹为原型的1980年电影《刑场上的婚礼》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
就广东而言，红色文艺创作具有天然的基础。周恩来、彭湃、张太雷等都在广东留下了丰富的素材资源。尤其是“靠理想活着、工作着，最后也为理想欣然死去”的彭湃，其生平之事，时隔百年仍能撼人心魄。

如何将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中的文学实绩，仍有诸多需要用力克服的创作问题。譬如，如何“疏离”当前作家在现实体制中的优势位置及相应的立场、眼光和趣味，重返历史，理解那些“长处在黑暗和沉默的人们的话语”，并重建其“情理”，又如何以饱满、可触的细节，为历史人物和事件生成现实之“肉身”，都很具挑战性。

当然，若能克服这些困难，那么“后四十年”所拥有的时代优势就能更充分展现出来：伟大的英雄可以在世俗烟火中成，反面人物也可拥有“自己的道理”，社会再现也不必再有固定“图式”而可直接切入最原生态的生活现场。

倘能如此，广东红色文艺完全有可能完美地与新中国同行，再度拥有如《红色娘子军》那样能够经受岁月考验的新的艺术经典。